

# 東協五國與毛共間的兩個問題

李柏泉

## ——論共黨顛覆活動與「華人問題」——

### 前言

多年來，有兩個問題構成當前東協各國內部的隱憂，同時也影響到各該國與毛共關係的演變。那就是各該國境內由北平支持的共黨叛亂與所謂「華人問題」。歷年來這兩個問題為各該國帶來的困擾，在程度上不盡相同，但總括而言，問題的性質并無二致。特別是前一問題更被東協各國共同認為是國境內安全的最大威脅。而後一問題，在許多情況下，又與前者有所關連，因此更顯現了兩個問題的複雜性。

早在毛共政權出現中國大陸之初，人們就憂慮到東南亞各地的華人，是否會被迫而淪為毛共的「第五縱隊」。這種惶恐之情，更因華人所構成的馬來亞共黨於一九四八年展開武裝叛亂，繼以一九五〇年毛共軍隊的投入韓戰，而達到最高點。因此，儘管周恩來在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中如何宣傳其「和平共存五原則」，東南亞各國對毛共的誠心絲毫未曾減低。事實顯示，自毛共政權成立之後的四分之一世紀裏，除却蘇卡諾統治下的印尼而外，當今東協各國均拒與毛共建立外交關係。但即使在那段友好期間，北平與雅加達的關係，亦始終難逃印尼境內「華人問題」浪潮的一再沖擊。而一九六七年，雙方關係的破裂<sup>①</sup>，更直接導因於毛共對印尼共黨「九、卅政變」的參與。

一九七五年，印支三邦相繼赤化，東南亞的權力結構呈現一種新的面貌。一方面是美國力量的急速衰退，另一方面却是蘇俄聲勢的大幅增漲。這自

非毛共所能容忍的。但無論與美國或蘇俄在此一區域競爭，毛共顯然具有幾項獨特的條件。除了區域內久已存在的廣大華人社會和各國境內早為毛共所培養和操縱的共黨武裝力量而外，毛共更是唯一與東南亞在地理上接壤者。正因如此，東南亞的去向，却也能影響到毛共本身的安危。特別在印支戰爭結束後，與其南疆相鄰的越南和寮國，均已呈現較為傾向蘇俄的立場。因之北平今後對東協各國的爭取將更全力以赴。

對東協五國而言，自一九六八年所謂的「吉隆坡宣言」至本年二月廿三日在印尼巴厘島舉行的第一次五國高峯會議，其主旨無非運用美國、蘇俄、毛共之間的均勢，以達成全域內「和平」、「中立」的願望。但事實表明，各國與毛共的交往，却遠不及它們對美或對蘇那般「單純」。因為各該國都難於擺脫前所述及的兩個問題的困擾。另一方面，毛共對此兩個問題的處理方式，也將左右其在東協區域內進退的成敗。

### 所謂「華人問題」

華人在東南亞擅長營商及保守中國文化，不易與寄居地的民族文化溶合。因之，被某些人稱之為東方的「猶太人」。實則，東南亞華人社會在許多方面有別於西方世界的猶太社會。何況後者畢竟是一個亡國近兩千年的民族，而復國後的以色列也僅是一個數百萬人口的國家，東南亞的華人則來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國。一九四九年以來控制中國大陸的毛共黨政權更自始即野心勃勃地推展東南亞各國共黨的顛覆運動，以配合其遠程的赤化目標。

雖然在思想上，東南亞的華人絕大多數無法接受北平的教條，毛共也擔心華人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習性，對其內部嚴加控制的人民可能產生的影響，因此，自一九四九年以來，毛共即長期斷絕各地華人與中國大陸的自由往來。經歷廿多年的演變，不論在經濟活動、思想模式、政治觀念、生活習慣、甚至民族情感和意識等各方面，東南亞的華人社會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距離，已愈趨遙遠。何況多年來，大多數華人已自願或被迫取得各居留地的國籍，成爲當地公民。然而，各地華人由於與中國的血緣關係，以及源自傳統文化的情感因素，恐非短期內所能消失者。

因之毛共政權對東南亞的各種行動，甚難不牽連或波及各該地的華人社會，進而激起當地久已存在的排華情緒，最後又會引起各該國對毛共關係的變動，一九六五年毛共在印尼的失敗，正是最鮮明的印證。

至於各地所謂「華人問題」的根本何在？簡言之，乃是民族主義的必然產物。一方面各個戰後獲得獨立的國家，無法再忍受華人在其境內經濟上的優勢地位，以及文化上的固守本身傳統，乃千方百計要將其排除或加以同化。另一方面，華人亦懷抱着本身的民族主義和優越感。然而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局勢的突變，使其既不能亦不願返回故國。但在其與當地民族同化的過程中，往往又呈現出無數的困擾和苦惱。此種現象，一則由於華人注重宗親觀念，常使其在取得當地國籍之後，對祖國的情感仍難忘懷。某些華人持有雙重國籍，亦難爲當地人民和政府所容忍。但就另一面觀之，某些國家對入籍華人的依然歧視，或不信任，或以二等公民待之。因之也就難獲致華人的向心。如此因果循環，問題自難解決。

在當前東協五國之中，各國歷史背景不同，華人與所在國家總人口的比數亦相去甚遠，因此各國在這一方面所產生的「困擾」，也就各有差異。

各國華人的總數，除星加坡外，甚難有一較精確的估計。但菲律賓的華人，其總數和在全國人口中的比數，均爲五國中之最低者。然當地華人社會歷年來遭受的排斥和打擊，却不亞於其他各地。一九五〇年代裏一連串的「非化案」，將華人的經濟權利剝奪殆盡。但華人申請歸化者，即使出生於菲境，亦甚難獲准，且須花費大量金錢。菲境華人教育原先甚爲發達，近年則遭到百般限制，馬可仕政府的最終目標乃是關閉境內所有華文學校。

泰國由於是東南亞唯一不曾淪爲西方殖民統治的國家，其所謂「華民政

策」規劃執行甚早。遠在一九一九年，即開始限制華僑教育，最終完全以泰國教育取而代之。以此爲手段，泰國同化了境內數百萬華人的絕大部分。同時，由於華人、泰人均信奉佛教，而雙方生活習慣相去亦不太遠，華人在泰國的同化過程顯得甚爲順暢。如今泰國上層社會，包括泰國皇室在內，多爲華泰血統的混合。

相較之下，信奉回教的馬來民族（包括印尼人和馬來人），對華人的同化却極爲艱難。蘇卡諾與北平「同盟」的期間，印尼境內的排華事件，亦未曾絲毫中斷。深恐此一問題危害雙方關係的發展，北平與雅加達在一九五五年曾協商簽訂條約，旨在解除華人雙重國籍的困擾。但結果適得其反，雙方關係更形緊張。而期間，蘇卡諾政府未曾放鬆對境內數百萬華人經濟和教育之步步限制。五〇年代末到六〇年代初，印境排華的浪潮愈形擴大。一九六五年，印尼共黨的流血政變，由於毛共的幕後介入和少數左傾華商的涉及，更引發爲清除印共，抗拒毛共和排斥華人三股怒濤，相互激盪的全國性大動亂。其後一九七三、七四年，再度於萬隆和雅加達爆發排華暴動。在每次暴亂中，華人的生命財產都普遍遭到慘重損失。許多反共無辜華人亦難倖免。印尼不但中止與北平的外交關係，並關閉境內所有的華文學校，以圖加緊迫使境內華人的同化。

馬來西亞的情況則有所不同。馬來半島（包括新加坡）華人總數超過當地巫人的事實<sup>②</sup>，深深影響到獨立後馬境的政治發展。而華人所領導的馬共游擊隊，早在中共席捲中國大陸的前一年，即已發動全面性的武裝鬥爭，企圖假借「民族解放戰爭」，奪取馬來亞的政權。問題是在馬來人的眼中，華人根本是外來的民族，因此這場「民族解放戰爭」，得不到馬來人的支持而招致失敗，也就是必然的結果。但當英國人離去之前，爲了「防止馬來亞淪爲中國的一個行省」，乃費盡心機設計出一套方案，將馬來亞獨立後的一切政治大權，全部保留在馬來人手中。憑着政治上的絕對控制，吉隆坡當局亦處處限制華人在教育、文化甚至經濟上的發展。根據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則，馬國至多是一個多種種族的國家，但華人却必須忍受次等國民的待遇。因此像一九六九年的華巫流血衝突，也就是意料中事，而且無人能保證未來不會再度爆發。近年來，馬共的死灰復燃，更使此種緊張形勢，產生微妙的激化作用。實際上馬共並未獲得華人社會的廣泛同情和支持，但是對於不少心懷

不平的馬華而言，馬共很可能成爲一個新的吸引力，至少在某些情況下，不爲可向吉隆坡當局施加壓力的一股力量。

一九七四年，馬來西亞與毛共「關係正常化」。其目的乃欲圖自北平獲得「不干涉他國內政」的保證，而斷絕部分馬華對毛共政權的某種企望，同時也斷絕毛共對馬共的支援。毛共是否絕對不涉及馬境的種族事件，尙有待而後的證明，但於雙方建交後未久，即已公然表明其繼續堅決支持馬共的立場③。

最後談到新加坡，雖然新加坡是由華人治理而華人佔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獨立國家。但是它竟也有自己的「華人問題」。正因爲它是一個華人佔絕對優勢的國家，而且獨立未久，因此其華人社會與中國大陸之間，在文化、民族方面的感情也就格外明顯。此種因素不但妨害新加坡國民意識的培植，而且容易對四周的馬來民族（包括印尼和大馬）產生某種刺激作用，而使其本身在政治上陷於孤立之中。因而新加坡不希望政治上，各國對其有任何「第三中國」的聯想。在其與毛共的交往上，也一直採取東協各國中最爲謹慎的步調。除了前述的理由而外，新加坡更擔心如果毛共官方代表在其境內出現，很可能壯大當地共黨的聲勢。所以新加坡領導階層曾多次聲明它尙需要時間鞏固其苦心經營的「國家意識」，在此有所成就之前，它不打算與毛共建立正式外交關係④。李光耀也曾多次強調如下的論點：「我們主要的關懷乃是新加坡人民全體的利益，此種利益包括在此一（東協）區域之內。同時種族、語言和文化上的關連也無法超越此等利益」⑤這已完全說明新加坡對中國大陸的外交立場，以及處理本身的「華人問題」的態度。

## 共黨的顛覆活動

由於地緣上的接近，以及華人社會的廣泛分佈，毛共對東南亞各地共黨運動的介入自是握有「地利人和」之便。雖則亞洲最早的共黨於一九二〇年成立於印尼，而莫斯科對此地區的各個共黨一直保持最高的領導權。但隨着毛共勢力的發展，及其與蘇共的爭論和敵對，毛共已取而代之，成爲東南亞大多地區共黨活動的幕後操縱者。東協五國中，由菲律賓的「新人民軍」、泰共和「自由泰運動」、馬來西亞（連同新加坡）共黨、而至飽受打

擊但部分領導人仍流亡北平的印尼共黨，莫不視毛共爲其領導和主要支援之源。

非共成立於一九三〇年代，最初即於農工階層間發展。二次大戰期間，曾起而領導抗日游擊活動，之後並控制虎克黨⑥，展開反對大地主和馬尼拉當局的武裝鬥爭。一九六〇年代曾遭到壓制。近年來改稱爲「新人民軍」，在毛共的支援下，重新展開武裝叛亂活動。非共的成員以非人佔絕對多數，亦包括少數的華裔，其與毛共的關連也就極爲自然。

泰國是東協各國中距離中國大陸最近的國家。但由於其未曾淪爲西方殖民地的歷史背景，以及農產富饒民生安樂的社會條件，共產主義在境內的滋長甚爲緩慢。直到晚近，共產思想在泰國的傳播，幾乎僅限於少數的華人或華裔泰人之間。此種現象，正如同馬來亞共黨發展過程中所遭遇的情況一樣。中國大陸雲南境內有數十萬泰族人民，自一九五〇年代以來，即被毛共利用來發展所謂「自由泰運動」，向泰境進行宣傳和滲透活動。

泰國東北邊區的數百萬居民多操寮語，二次大戰後有近八萬支持胡志明北越人移入，因此受河內指使的共黨活動，近年來在該地區發展甚速。而且印支戰爭結束後，河內已成爲東南亞一個不容忽視的新力量，而其親向莫斯科的立場，必將刺激毛共加強對泰境共黨運動的掌握和推進。因此，未來泰境的共黨鬥爭，必將較其它東協國家內的情況來得複雜和多變。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之成立，較毛共的出現早了一年，但其成立數年後，即因策動一九二六和二七年的暴動事件，而遭荷蘭政府的壓制，二次大戰後方告復活。獨立後的印度尼西亞，在蘇卡諾統治之下，不但成爲目前東協組織中第一個承認毛共政權的國家，雙方關係的友好發展亦甚迅速。在那段期間，印共不但享有合法地位，同時發展極快，不但成爲印尼最大的政黨之一，並號稱爲「非共世界最大的共黨組織」，而且其組織健全、紀律嚴謹、財力雄厚。一般相信印共不但自左傾華商得到鉅大經援，更受到毛共駐雅加達大使館的指使。相對之下，蘇俄共黨對印尼共黨的影響力，彼時降至最低點幾等於零。同時，由於毛共在印尼境內的強大聲勢，以及印尼當局並未因其與毛共關係的「親密」而放棄國內的排華運動。當時前往中國大陸接受教育的華裔青年亦特別多。⑦

一九六五年，印尼共黨突然發動一場流血政變，欲圖奪取整個印尼政權

，但在殘殺六名軍事將領之後，立刻遭到陸軍猛烈的反撲，於是展開一場印尼史無前例的反共大搏鬥，全國傷亡慘重，元氣大傷。印尼共黨乃告瓦解，殘餘份子則潛伏各地。目前印境加里曼丹與馬來西亞交界處之叢林地帶，仍有大多為華人組成的共黨游擊活動。

「九、卅政變」後，在全國蔓延的反共怒濤中，毛共駐印尼的機構均遭民衆擊毀，印尼並中止對毛共的外交關係。儘管目前東協的馬來西亞和泰國、菲律賓已先後與毛共建交，印尼仍持戒備態度。除却「九、卅」的餘孽尚存，境內「華人問題」，未獲穩定之前，它顯然不願再嘗毛共滲透的苦果⑧。

其次談到馬來亞共黨。本文前已述及，在中國人的南洋移民活動，隨著一九四〇年代的結束而結束之後，馬來亞半島（包括新加坡）的華人總數，竟然超越了當地的土著民族。此一整個東南亞僅有的情況，自然對馬來半島以及半島上華人的政治活動與發展，有著莫大的影響。

實際上，正如衆所周知，馬來亞共黨的前身，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南洋支部」⑨。換言之，在全世界的共黨組織之間，毛共與馬共的關係是遠超乎所謂「兄弟黨」的關係。馬共不但成立之初即為清一色的華人團體，之後數十年的發展中，亦始終難以有效地吸收當地的馬來人或印度人。時至今日，情況依然沒有重大改變。共產主義的早期信仰者，都堅信共產思想的「國際性」；都認定「無產階級革命」是「超越國界的」。然而，在一個像馬來亞那樣的多元社會中，共產運動不論歷盡多少努力，却無法突破民族主義的鴻溝。在馬來亞，簡單的邏輯乃是：共黨都是華人，馬來人天生不喜歡華人，所以也就不可能接受共黨。再加上，馬共歷時十二年的武裝恐怖活動，更使馬來人厭惡共黨⑩。

雖然，即使在華人社會之內，馬共也只是得到少數人的同情或支持，而且其歷來攻擊與殺害的對象，也以華人居多⑪。但是，在獨立後的馬來西亞，華人普遍於政治上、教育上、文化上乃至經濟上，遭受壓制和歧視的情況之下，馬共強烈的華人色彩，以及大馬軍警中馬來人佔壓倒性多數的情況，對馬國未來政治的發展，必有爆炸性的威脅。共黨在印支三邦的勝利，鼓勵了馬共重新展開「民族解放戰爭」的決心。吉隆坡當局原期與北平建交後，

北平會減低甚至斷絕對馬共的支援。然而，事實的發展，顯示了大馬領導人的期望已成幻想。

共黨在新加坡的活動，一九六〇年前後達到了最高潮。英國人離去後，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曾利用新共的支持而獲得大選的勝利。但一九六一年新共脫離了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的華人社會中，展開了親毛共的運動，并企圖在下次選舉中奪得政權。此一情況，曾引起馬來西亞的警覺，當時東姑拉曼提議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北婆羅洲的英國屬地，共組馬來西亞聯邦，以平抑新共的氣焰。

馬來西亞聯邦之所以要特別包括幾個前英屬北婆羅洲領土，乃是要降低華人在全聯邦人口中之比數。但聯邦成立方兩年，李光耀領導的華人政治力量流露出終將奪取大馬政權的野心⑫，新加坡乃被排出大馬。這段戲劇性的過程，正足以說明「共黨」與「華人」兩個問題對吉隆坡政府所造成的雙重壓力，以及這兩個問題本身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與相互間的影響。

## 結語

東南亞的所謂「華人問題」，自然是歷史的遺跡，而東協各國的共黨顛覆活動，則是毛共一手經營的結果。這原本是性質、形態各異的兩個問題，但是，由於各國共黨均有當地華人參與活動，甚至是華人領導的組織，因此這兩個問題常會微妙地糾纏在一起，互為影響，彼此激盪。

這兩個問題，不但久為東協各國本身的憂慮，毛共也逐漸體驗到為其帶來的困難。尤其在現階段，它必須全力與蘇俄競爭東協各國的「友誼」，更有此種感覺。特別是「華人問題」所常引起的複雜情勢，毛共似早欲加以「擺脫」。「文革」以來並停止了其「華僑事務委員會」的組織和活動。其與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建交」之時，均對各國境內的華人國籍問題做了談判。但正如本文前所述及的，所謂的「華人問題」，往往並非國籍的確定即能解決者。

關於東協各國內共黨顛覆活動的問題，儘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在其與毛共「建交」時，均自毛共獲得「不干涉他國內政」的保證。但旋踵間

毛共即公然表明要繼續發展與各國「兄弟黨」的親密關係。實際上是撕毀了這種「保證」。

五〇年代，許多人曾擔心，東南亞廣大的華人社會可能全面倒向毛共而成為其席捲東南亞的「先鋒隊」。而後事實證明，這種憂慮全然多餘。相反地，事實却顯示，正因為東南亞有著久已存在的華人社會，以中共為後台的共產運動，竟遭遇到強大的阻力和挫折。馬共的悲劇即為最鮮明的例子。事實上，人們早已注意到一個現象，那就是在整個東南亞地區，凡是「成就」愈大的共黨，其組織中的華人色彩也就愈為淡薄，例如越南、寮國、高棉以及「九、卅政變」前的印尼共黨。相反的實例除了馬來西亞外，尚有新加坡和泰國。相信這不是偶然的巧合。近年來莫斯科則率直地指出「華人問題」和「北平商標」的共黨顛覆活動，為毛共在東南亞的兩大「弱點」<sup>⑩</sup>。

當然，許多問題都像一個銅板，有著正反兩面。因此，對任何問題處理的態度和手段，往往是決定最後成敗的重要因素。毛共在東協各國的情況亦復如此。無論如何，今後在蘇俄強大的壓力之下，北平可能盡力避免由此兩項問題所引起的挫敗。——像在印尼的「九、卅」事件中它體驗過其滋味。

但是，另一方面，人們亦須瞭解到，北平已再三表明任何代價，也不會使其終止對東協各國共黨顛覆活動的繼續支持。周恩來死後，人民日報刊載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等東協國家元首的「唁電」的同時，竟也分別刊出該國共黨中央委員會的「唁電」<sup>⑪</sup>。這清楚地表明了毛共今後對東協各國「政府對政府」與「兄弟黨對兄弟黨」分途並進的兩條路線的策略。

註釋：

① 一九六五年「九、卅政變」後，印尼境內湧起反共浪潮，至一九六七年十月，雅加達宣佈中止與北平的外交關係。

② 據一九六二年之統計，馬來亞聯邦之華人佔三七·二%，馬來人佔四九·八%；新加坡之華人佔七五·三%，馬來人佔一三·五%，兩數相加星馬合計之華人佔四四·三%，而馬來人僅為四三%。見 B. Simandjuntak, *Malayan Federalism, 1945—1963*, London, 1969, P.130

③ 設於中國大陸之「馬來西亞革命之聲」電台，在毛馬建交之後，不但未曾停止對馬國政府的攻擊，更公然宣揚慶祝馬共成立四十五周年。

④ 由於北平控制的「中國銀行」一直在新加坡公開營業，新加坡多年來即透過此一銀行與中國大陸進行廣泛的商務關係。而「中國銀行」亦被認為是毛共駐新加坡的「地下使館」。參見 Robert L. Rau, *Normalization with PRC: with Emphasis on ASEAN States*, January, 1976, Tokyo, pp. 238—240.

⑤ 見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 19, 1975.

⑥ 虎克黨游擊隊員，最初大多為赤貧農民，某些領導人為共黨份子，後來全部被共黨所控制。

⑦ 同④見第二四三、二四五頁。

⑧ 印尼外長於巴黎越南和談會議時，曾告訴毛共外長姬鵬飛道：「印尼需要時間教育其境內華人向印尼效忠，莫再傾向北平」，據馬立克稱，姬表示同意此一觀點。見 *The Japan Times*, April 27, 1973.

⑨ 馬共萌芽於一九二〇年代的新加坡，最初只是少數知識份子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一九二八年初，毛共派遣幹部成立「南洋共產黨」，一九三〇年解散，改為馬來亞共產黨。

⑩ 參看 Lucian W. Pye, *Guerrilla Communism in Malaya: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Meaning*, Third Printing 1967, p. 57.

⑪ 參看 Lennox A. Mills, *Malaya—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ppraisal*,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58, p. 51

⑫ 李光耀的「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口號和政治目標，顯為獨佔政治大權的馬來人所無法忍受。參見 R. K. Vasil, *The Malaysian General Election of 1969*, Singapore,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2—13, pp. 43—44.

⑬ 見 *Sino-Soviet Rivalry in Southeast Asia*, Problems of Communism, September-October, 1974, Washington D. C., p. 44.

⑭ 見「人民日報」，一九七六年元月十日至十四日。